

# 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

周敏 林闽钢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velop the concept of the “ethnic capit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enclave economy, the authors argue that ethnic capital is not a thing but involves interactive processes of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within an identifiable ethnic community. The authors use case studies of centenary Chinatowns and emerging middle-class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to illustrate how ethnic capital affect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ransformation,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the social mobility of immigrants. The paper speculates on how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ethnic enclaves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al notion of assimilation and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dynamics.

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社区——唐人街(Chinatown),出现于19世纪末,它是美国历史上西海岸反华运动和1882年联邦政府排华法案产生的直接结果。在随后的发展中,唐人街逐渐形成了它鲜明的族裔文化和经济特色,赢得了早期华人移民的认同,成为美国最具特色的族裔聚居区之一。在过去的30多年间,伴随着华裔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新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美国华人移民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传统的东西海岸华人聚居城市及其他城市中涌现出许多与唐人街有着质的差别的新华人聚居区,纽约市的法拉盛社区(Flushing)和洛杉矶地区的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就是其中的典型。为此,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当今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成为目前移民社会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本文针对移民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以美国华人新移民社区发生的新变化为考察个案,从社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和互动关系的视角予以分析,提出“以族裔资本为中心”的解释性框架,并尝试解释“美国华人移民社区转型”的命题。

## 一、社会资本、族裔资本与移民社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当今社会学最热门、运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但对于如何定义、把握和使用这个概念,却一直存有异议。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指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还包括在人际交往和网络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便于获取权力和资源的机会和途径(Bourdieu, 1985: 241—258)。科尔曼的定义则强调其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以及它的功能,即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换言之,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受制于社会结构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会有助于或有碍于个人和群体的行动以及目标的实现(Coleman, 1990: 302)。后来的许多学者更试图从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的模式、或个体与组织的互动过程来理解社会资本的内涵,如波特斯在总结了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后提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某种个人或群体的能力——一种因行动者在其所属的结构和网络中所拥有的成员身份而保证其受益的能力(Portes, 1988)。还有人从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社区、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多种层次和角度来理解、定义和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诸如普特南就意大利传统工业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程度与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阐述社会资本,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类似于道德的物质资源。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产生并体现于大众交往的社会网络之中,由于长期以来大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进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

并互惠的物质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Putnam, 1993)。

那么,社会资本与移民社区发展又是什么关系呢?不同理论派别对此问题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源于同化论的观点。此观点认为,移民社区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而移民文化是次等文化,无论何种背景的移民,最终都要放弃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脱离边缘社会的制约,才能打入主流社会之中。新移民初到异地,大多处于劣势,如外文程度差、教育水平低、人才和金融资本不足、缺乏劳动技能等,难以直接进入主流社会,所以他们往往依赖自己族裔的移民聚居区谋生,从环境较差的社区和收入低微的职业起步,通过社会经济方面的积累和成就,逐渐站稳脚跟,进而进入主流社会。一般来说,成功人士最终的结果是搬出族裔的移民聚居区,融入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层居住区(Wamer & Leo, 1945; Gordon, 1964)。在同化论的观点看来,移民聚居区只不过是跳板,移民社区发展的最后结果可能是:原来的族裔移民社区或随着其成员被主流社会的同化而慢慢消失,或因其成功人士的纷纷搬离而留下一个不断衰退的贫民窟。这一观点来自对欧洲族裔移民(如犹太人、意大利及其他东欧移民)的研究,同时也有效地解释了美国许多中心城市少数族裔社区,尤其是黑人区不断衰弱的现象。同化论强调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对移民向上流动的关键性作用,而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价值有限的、过渡性、最终要抛弃的东西,忽视了社会资本与族裔社区的其他结构性因素互动的过程和结果(Zhou, Min, 1992: 229)。

另一种解释源于多元论的观点。此观点认为,少数族裔的移民社区是主流社会整体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它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多么不同,各族裔独特的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文化习俗本质上都会对主流社会有贡献。从经济上看,当今美国主流经济已经与少数族裔的经济融为一体,相互依存。相对于主流经济而言,少数族裔经济有它独特的一面。在主流经济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企业运作和经营的决定因素;而在族裔经济中,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不仅依靠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更多的情况下,少数族裔企业的成功还取决于企业家如何运筹和积累社会资本。一方面,在缺乏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时,少数族裔企业家通常可以依靠族裔文化价值观及其团结精神,以及由信任和互惠所培养的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来经营企业,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这些族裔资源使得族裔企业家扩大了盈余利润,增强了在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族裔的劳工阶层也可以依靠本族裔的人际网络和一些社区组织的帮助而获得就业信息和机会,并找到适应社会、向上流动的方向和途径(Light, 1984)。多元论的观点虽然突出强调社会资本本身的作用,但却没有注意到社会资本如何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互动。

民族聚居区经济理论(enclave economy theory)则融和了上述两种观点。民族聚居区经济理论既讨论经济也讨论文化。首先它强调民族聚居区经济是主流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民族聚居区经济又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色彩,即它是由以族裔为主的劳务市场、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三方面组成,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相对独立运行的一个族裔经济结构(Portes & Robert, 1985)。民族聚居区经济的主要功能是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运用族裔财力、人力、市场资源以及文化资源去与主流经济竞争。一方面能为族裔企业家提供创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并加强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能为劳工创造就业机会和将来创业的可能性。例如,低技能的新移民聚居在自己的族裔区内,可依靠民族聚居区经济克服种种语言和文化以及结构性的障碍,进而逐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避免陷入长期贫穷的困境。结果是族裔企业家和劳工双方互赖互惠,通过家庭、亲朋、族裔间互动所形成的网络、本族裔的社会组织和群体间良好的文化共性等来促进民族聚居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族聚居区经济理论把注意力放在族裔企业和个人与特定的族裔社会结构和文化互动的依据上,吸收了多元论的某些有关民族文化的观点,强调民族聚居区经济的特殊性和互动性。该理论还指出,对民族聚居区经济的研究应把焦点集中在结构条件上,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结构方面的因素,会导致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总而言之,民族聚居区经济理论不仅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而且重视社会资本如何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和结果。

鉴此, 本文认为, 对于一个特定的族裔聚居区来说, 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既可以独立发生作用, 而且可以共同发生作用。所以, 我们认为族裔资本实为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互动过程(interactive processes)。其中, 金融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资金和有形的物质财产。它外在于社会行动者, 为社会行动者所占有; 它因投资而减少, 因盈利而增加, 因亏损而丧失。人力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个人的教育程度、劳动技能和工作经验。它内在于社会行动者, 不因使用而减少, 通过反复使用反而能导致其充实和增值(但也可能在某种外部条件影响下导致其贬值)。本文从族裔社区这一层面, 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行动者与社区结构的一种互动过程。具体地说, 社会资本指的是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获取某种物质和精神资源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源于行动者与其他个人或组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因此, 社会资本的多寡与得失取决于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和影响。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资本的基本属性为关系属性、非正式属性和动态属性。

对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华人移民社区不同阶段所呈现的状态, 及其在华人移民社区转型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我们将分别以纽约唐人街作为传统华人移民社区的典型, 以纽约的法拉盛地区和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作为新华人移民社区的典型, 来加以比较分析。

## 二、美国传统华人移民社区族裔资本的分析: 以纽约唐人街为例

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 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无限制移民时期(1848—1881 年), 排华时期(1882—1943 年), 配额移民时期(1944—1967 年), 当代移民时期(1968—)。在无限制移民时期, 到达美国的华人主要是来自广东沿海因应美国西部的大开发而被招募的劳工或苦力。1851 至 1860 年间, 大约有 41000 名中国劳工到达美国西部, 他们几乎全部集中在加州, 84% 在矿山劳作。1860 年代后期, 中太平洋铁路公司除了从已到美国的中国矿工中招募人手去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西段外, 还从中国直接招募新的契约劳工, 这一时期, 每年约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抵达美国。这些早期来美的华工不仅没有能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淘金发财后衣锦还乡, 反而很快发现自己成了被歧视和排斥的对象。铁路修成后, 尤其在 19 世纪 70 年代, 华工受到当地白人劳工强烈反华情绪的骚扰和白人工会的极力排斥, 被认为是与白人抢饭碗的“黄祸”, 在“中国佬滚回去”的口号下, 加州劳工党推动美国国会于 1882 年通过了排华法案, 后于 1892 年又将该法案无限期地延续并扩及到所有亚裔移民。在排华法的制约和美国社会不予接纳的情况下, 华人移民只能把自己圈在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区域内, 部分华人为了逃避在加州可能遭受的迫害, 逃到美国的东北部海岸城市, 于是形成了早期美国东西海岸城市的唐人街。从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长达 60 多年的时间里, 华人一直被美国的法律和社会所排斥。正如美国著名移民社会学家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所说:“事实上这些唐人街, 不是由企业家深思熟虑精心策划建造的, 它是由美国社会残酷的现实引起的一种适应性反应, 这个事实, 对唐人街后来的发展, 有决定性的影响。”(Zhou, Min, 1992: 3)也就是说, 今天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城市所看到的唐人街, 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排华所形成的。

在 1965 年之前, 纽约唐人街的移民主要是来自广东四邑地区及其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这些早期移民不懂英文又识字不多, 缺乏适合市场需要的熟练技术和经验, 对美国社会不了解, 根本不可能较快地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和经济, 只能居住在唐人街, 依赖唐人街的族裔经济生存, 进而站稳脚跟, 从长计议。他们不仅缺乏人力资本, 也缺乏金融资本。因为早期的华工大多数是被“买”的“猪仔”, 除了用很低的工资定期偿还高昂的跨洋旅行费用, 还要赋重税, 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投资创业的金融资本。在后来的发展中, 虽然部分移民有了一些个人积蓄, 但由于他们把唐人街看成是临时的类似家乡的避难所, 淘金后荣归故里才是最理想的归宿, 所以, 大部分移民把积蓄寄往国内家中和用于自己的基本消费。唐人街则由此缺乏足够的金融资本的投入, 因而影响了其自身的经济结构的发展, 使它局限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中——如洗衣业和餐馆业。后来, 随着洗衣业的萎缩, 虽然发展了制衣业和零售批发业等, 但也

只限制在低成本投入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中。

由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缺乏，华人移民只能把自己囿于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区域内，加上外部的压力，唐人街这个封闭的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族裔凝聚力较强的移民社区。为了满足华工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各种需要，传统的、家庭式的成员相互重合的社区组织便纷纷出现。唐人街传统的社区组织有三大类：宗亲会、同乡会和商会。由于华工都是只身赴美，因此，这些传统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男性。社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催生和整合了族裔社区结构，而且还对社区事务，特别是社区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宗族组织的规模小到 20 人大至 100 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些组织通常是家庭式的，有专门场地供成员食宿、做生意、就业、娱乐等。后来产生的中华公所，不仅将宗族组织、乡土地域组织和商会组织置于统一领导之下，还不断利用各种组织关系、雇主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亲缘关系来强化其权力，对社区生活和商业活动进行有序的管理，规范社区事务和个人行为，对外则代表华人为社区及其成员争取权利。家族、宗族和乡亲关系以及跨国劳工招募机构共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网络是早期华人对外移民的惟一通道，其结果是到美国的华人移民往来自同一村落或是血亲，而且是成群结伙而行。这样一个以血缘、亲缘、地缘和族裔为基础的家庭式的网络关系明显存在于早期华人移民过程和华人社区中，它是如此的重要。唐人街的全部商业活动都与圈子狭小的宗族网络或宗亲团体有关，都是在面对面交往的亲密社会关系环境中运作——所有有关商务、服务的经济活动以及开业、雇工的消息，都是通过面对面的首属社会关系，通过熟人以口头方式传播出去(Zhou, Min, 1992: 208—209)。某个酒楼餐馆的老板有可能就是某个宗亲团体的负责人，他餐馆里雇佣的员工往往就是他的乡里乡亲。这样一来，在移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关系网又把移民凝聚在唐人街里，每个成员或组织既受益于也受制于这种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相当强的网络关系。

在传统唐人街，虽然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薄弱，但却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唐人街的社会资本特点表现为：(1)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强纽带性。曾在移民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造就了唐人街社会基础关系的强纽带性。(2)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强嵌入性。唐人街传统社区组织的出现弥补了社区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不足，这些传统的社区组织统一配置了社区中绝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这意味着如果脱离了这些社区组织，也就失去了获得经济和社会生活资源的可能，结果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关系均嵌入在社区社会结构之中。(3)族裔社区的强凝聚性和排斥性。社会资本具有关系属性，也就是说，由雄厚社会资本为基础所建构的移民社区，对内会产生强凝聚性，对外会产生强排斥性。

所以，我们认为在传统华人社区中，构成族裔资本的社会、人力、金融资本三者关系如下(见表 1)：

首先，在封闭的传统族裔社区内，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发展的基础。对于传统的移民聚居区来说，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正如格兰诺维特所论证的，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Granovetter, 1985)。新经济社会学有一种认识认为，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特定的群体，都同时拥有一些不为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包括特定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亲朋网络，还包括种种用以约束人际社会关系的情感、信任、承诺和其他文化价值观、道德标准，等等。这些构成了一个族裔社区特有的社会资本。在传统华人社区中，雄厚的社会资本是华人社区的基础，社区内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直接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和制约。

族裔资本构成	强弱表现	族裔资本内在关系
社会资本	+	基础
人力资本	-	结果
金融资本	-	结果

其次，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结果。(1)在传统唐人街社区中，对那些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低、不懂英语的移民来说，他们不可能在唐人街外找到工作，但通过以家庭、宗族关系等为基础所构成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就业网络，他们便能在唐人街谋到相应的职位和收入，有效地减少为寻找工作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为重要的是唐人街的许多职位，不必登广告，企业家就是依靠社会

网络来招收雇工的,结果使原来的家庭式经营的企业在社会关系方面进一步得到强化(Zhou, Min, 1992: 223)。(2)在族裔聚居区的企业家和劳工,双方都愿意接受相互尽义务、信任和忠诚的制约,因而双方也从中得到利益,这就构成一种只有在民族聚居区之内才存在的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企业家因此而降低了管理成本和劳工成本,增加了利润;而劳工既能较容易地获得就业机会,又能通过职业培训积累技能和工作经验,为将来创业和迈向主流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3)在族裔社区内,通过各种信用社、储金会和其他“会”的形式,企业家能获得创业所需的小额金融资本和其他资源。结果,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地增强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也得以进一步的强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在社会资本基础上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华人移民社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社会资本化(social capitalization)的过程。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雄厚和社区的社会资本化,使得唐人街的族裔单一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从而导致社区更加排外和封闭。同样,唐人街经济与社会互动的二元性,也由于社会资本化的表现而不断强化,从而导致传统华人移民社区难以根本转型。

### 三、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以法拉盛地区和蒙特利公园市为例

法拉盛位于纽约市皇后区(Queens Borough)北部,它属于纽约市,但又远离市中心曼哈顿的唐人街。20世纪70年代,亚裔和拉丁美洲裔的大批移民移入之前,法拉盛是一个安逸的、人口稀疏的典型的都市边缘住宅区,主要住户是中等收入的蓝领白人,而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是不受欢迎住在这一区域的。法拉盛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仅有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洗衣房,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家庭寥寥无几。

20世纪60年代法拉盛开始随美国郊区化和主流经济体制转型而衰退,白人人口急剧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大批移民,尤其是亚裔移民的到来才开始繁荣起来。有关数据显示,从1980到1990年10年间,法拉盛人口增长了14%,是整个纽约市人口增长率的4倍,这一人口快速增长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1990年法拉盛人口中有43%在美国本土外出生,相比之下,整个皇后区在美国本土外出生的人口比例仅为29%,而整个纽约市仅为27%。在近30多年的时间里,法拉盛的人口发展趋势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居民从法拉盛快速向外迁移和老龄化,导致其人口比例逐年下降;二是新移民人口大量涌入,少数族裔人口不断上升。法拉盛的白人居民往外迁移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它所属的皇后区和纽约市。从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期间,法拉盛白人居民的人口比例从97%下降到43%;从1980年到2000年这20年间,白人比例又从43%下降到13%;相比之下,2000年整个纽约市白人居民的人口比例为40%。随着亚裔和拉丁美洲裔大批移民的移入,法拉盛黑人居民的人口比例也逐年下降,从1980年的14%下降到2000年的6%,而法拉盛的华人和其他亚裔居民的人口比例则从1970年的6%上升到2000年的56%,此外,拉丁美洲族裔在法拉盛的居住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12%上升到2000年的21%(Zhou, Min & Rebecca, 2003: 124-149)。

法拉盛的亚裔居民占当地居民的大多数,而亚裔中最大的三个移民群体是华人、南韩人和印度人,其中华裔人口占法拉盛总人口的27%,韩裔人口占13%,印度裔人口占10%。法拉盛商业中心也显现了这三大族裔群体的特征,尽管法拉盛常被称为“第二唐人街”,但与早期唐人街华人族裔的单一性这一特征相比,法拉盛以亚裔为主、多族裔混合的特征更明显。

在移民大批涌进之前,法拉盛的社区经济主要以零售业为主,由一些小的专营店和服务性的零售商店构成,家具店、日用品商店和餐馆等等大都以“夫妻”店的形式经营,也有几间连锁百货商店和超市。20世纪70年代早期,纽约的经济衰退严重冲击了法拉盛的社区经济,使许多小商店和公司关门倒闭。随着70年代末亚裔移民的到来,法拉盛才被注入大量的外来金融资本,社区经济由此开始发生变化、复苏和繁荣。今天,新的商业活动扩展了原有的商业中心区,在社区的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可看见多家

美国大银行分行和亚裔所属银行,多种语言路牌和广告牌。走出地铁总站,还会看到许多高档的中餐馆和功能品种齐全的华裔超市,整个区域点缀着华人经营的小咖啡店、水果店、药店、快餐店和其他商店,给人身在唐人街的感觉。但它是新型的华人移民社区,也是族裔多元化的新移民社区。在商业中心的街道还有许多由南韩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国人经营的餐馆和商店。扩展的社区商业中心变得熙熙攘攘、充满活力。

蒙特利公园市位于洛杉矶县的东郊,是构成洛杉矶县的84个卫星城市之一。该市约7.7平方英里,建筑密度低,住户稀疏,距洛杉矶市中心的唐人街仅10多分钟的车程。它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典型的西南部卫星城市。与纽约市的法拉盛相似,二战后蒙特利公园市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白人,有关数据显示,1950年该市白人居民的比例为99.9%。由于具有中产阶级的安逸的郊区居住环境,又接近洛杉矶市中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蒙特利公园市逐渐吸引东洛杉矶市的美国本土出生的墨西哥裔人和西洛杉矶市的美国本土出生的日本裔人及华裔人往这里迁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蒙特利公园市白人居民下降到85%,拉丁美洲族裔居民占12%,亚裔居民为3%,黑人居民为0.1%。有关数据显示,蒙特利公园市白人居民的比例从1970年的51%迅速下降到1990年的12%,到2000年再下降到7%。此外,拉丁美洲族裔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居住比例从1970年的34%下降到2000年的31%。与此相反,亚裔居民的比例则从1970年的不到15%急剧上升到1990年的56%,到2000年达到62%(Zhou, Min & Rebecca, 2003: 124—149),形成了典型的少数族裔郊区(ethnurb)(Li, Wei, 1997)。在蒙特利公园市的亚裔居民中,大多数是华裔,占到亚裔总人口的67%,其余的亚裔包括美国本土出生的日裔美国人,占12%,越南裔居民占8%。1980年,蒙特利公园市只有31%的人口在美国本土外出生,到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1%。

20世纪7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的移民投资者携带大量的金融资本进入蒙特利公园市,导致了蒙特利公园市在70年代的急剧转变。60年代,蒙特利公园市是一个安逸的住宅郊区,商业活动不很突出,主要的商业街道上仅有一些小专卖店、超市和餐馆。晚上,当地居民返回他们安逸的家时,街道是安静的。如今华人所拥有的大型超市和购物商场已经取代了原有各种零星的小商店和餐馆,成为该市的商业核心。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也迅速扩展它们的空间和服务范围。这些商店和餐馆的生意从早到晚、一周7天忙个不停。尽管这里的某些商业活动与唐人街有相似的地方,如“夫妻店”餐馆、食杂店、礼品店和其他小规模的服务性商业、作坊式的生产业等,但新涌现的大多是现代化经营、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企业。这些企业涉及范围很广,从美国味十足的超级市场、金融保险公司、房地产发展和中介公司、汽车经销行、货品仓储、分销、包装、运输、高科技设备生产和组装工厂,到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饮、旅游、广告、医疗保险,还有法律、财会、教育、翻译及其他咨询服务机构等。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和企业不仅规模较大,而且通过结合族裔和西方的管理和营销技术来提升和改进亚洲商品的服务和销售。在这个意义上,蒙特利公园市已成为一个跨文化、跨族裔、跨地区的华人经济活动中心。诸如法拉盛和蒙特利公园市这样的新型的中产阶级的华人移民社区,目前在北加州和靠近纽约市的新泽西州的一些城市相继涌现并发展迅速。

在这些新华人移民社区,由于通常是族裔多元化杂居,华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和频繁。同时,华人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主流社会的政治活动,如社区议员竞选等。与传统的唐人街相比,这些新华人社区面积更大,人口构成更复杂,新移民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大批华人移民带来雄厚的族裔资本进驻社区,并创建和经营各种业务:公司、工厂、商场和办公楼等,形成了富有现代经济气息的中产阶级的族裔聚居区,它的多元性、开放性及全球化的特征相当明显。

#### 四、美国新华人移民社区转型中的族裔资本分析

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始于二战以后,但根本性的变化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华

人移民社区转型的主要原因是移民法的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持续上涨的移民潮。美国政府于 1965 年通过移民改革法案,放宽移民入境政策,取消国家配额移民的限制,优先家庭团聚,同时开放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技能劳工的移民,此移民修正法于 1968 年实施。移民改革法案所引起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量非欧洲裔移民的到来。华人移民首先是大批从中国的台湾、香港,而后从大陆以及世界各地来到美国,这些新移民带来了各源地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大大地推动了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据统计,这 40 年间,美国华裔人口整整增加了 10 倍,1960 年美国华人不到 24 万人,2000 年达到了 290 万人(包括近 50 万的华裔混血儿)(Zhou, Min, 2003: 37-44)。根据美国联邦移民归化局的统计报告,1961 年至 1990 年这 30 年间,有将近 80 万华人以永久居民身份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移民美国。1991 年到 2000 年的 10 年间,又有将近 53 万华人移民美国(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1998)。1965 年以后来美定居的华人移民(以下简称新移民)约有 80%以上是亲属移民,约 20%属于职业移民。

华人新移民较早期华人移民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首先,新移民的来源地多元化。早期移民几乎全来自广东的南部地区,而新华人移民不仅仅来自中国大陆,而且还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或中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以洛杉矶为例,1990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人口占洛杉矶华人总人口的 23%,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占 27%,来自台湾的占 20%,来自香港的占 8%,其余的 22%来自世界各地(Zhou, Min, 2003: 37-44)。

其次,新移民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大多数早期移民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低下,来美国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相应的劳动技能和钱财积蓄,这些华工被迫从事低薪的工作,聚居在环境较差的唐人街里。而新移民则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都市的中产阶级,不仅带来了较宽裕的钱财积蓄,还拥有比美国人平均水平还要高的受教育水准和专业技术。从全美国范围来看,1980 年和 1990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华人移民所受教育的水平高于美国人口的平均水平,在劳动技能水平方面也是如此。199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适龄就业(25 到 64 岁)的人口中,非西班牙语系的白人受过大学 4 年甚至更多的教育者占 21%,而美国境外出生的华人移民则占 42%。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移民从事专业工作的劳动力人口(35%)比例也高于美国白人(27%)。此外,在 1989 年,华人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 3.4 万美元,高于同期全美家庭收入的中位数:3 万美元(Zhou, Min, 2003: 37-44)。

最后,在居住模式上,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的居住模式一方面显示出集中化,即新移民继续集中在西部和东北部移民较为集中的都市地区。仅加州一个州就集中了超过 40%的华人移民,纽约州集中了 16%,夏威夷州集中了 6%。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扩散化。新移民也开始散居到美国其他一些在历史上华人很少涉足的州,如田纳西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这些州的华人人口都超过 10 万人。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波士顿这些城市的唐人街,传统上是华人移民的聚居区,如今仍然存在并接纳新移民,但这些传统聚居区对于许多新移民来说不再是主要的落脚地。特别对于那些富裕的和拥有高技能的新移民,抵达美国后有意绕开市中心的唐人街而直接在城郊中产阶级的住宅区购房定居。到 2000 年,洛杉矶仅有 2%的华人居住在唐人街内,同样,旧金山和纽约仅有 8%和 14%的华人分别居住在各自的唐人街里,大多数华人人口分散在郊区,包括新的以移民为主的少数族裔郊区(ethnoburb)。20 世纪末,新的少数族裔郊区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移民城市。

上述表明,华人新移民显示了与早期华人移民有着显著差别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族裔资本的这些变化也清晰反映在华人社区转型中。

法拉盛的华人新移民的教育水平高于全美国平均教育水平。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中,每百人中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占有率两倍于当地居民的占有率;从台湾来的新移民中,每百人中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占有率则三倍于当地居民的占有率。尽管在过去 30 多年中,法拉盛的白人中产阶级居住人口不断往外迁移,但大量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人口素质优良,使法拉盛仍然维持了较好的水准。在蒙特利公园市,华人新移民所受的教育水平也大大地高于整个洛杉矶地区的平均水平,到 1990 年,42%华裔成年人

完成了4年以上的大学教育,而整个洛杉矶地区,仅有22%成年人完成了4年以上大学教育。同时,蒙特利公园市接近40%的华裔拥有专业工作,而整个洛杉矶地区,仅有27%的人口拥有专业工作(Tseng, Yenfeng, 1994: 54)。

法拉盛华人社区最初发展的动力,来自台湾移民的人力资本和雄厚的金融资本。台湾移民缺乏与曼哈顿唐人街内华人移民的联系,他们也不认同早期华人的传统生活,对唐人街内浓厚的广东语言文化气息不能完全接受。优良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经济资源,使他们能在远离唐人街的白人社区聚居,并迅速建立他们的聚居区经济和族裔社区(Zhou, Min & Logan, John R., 1991)。新的华人移民聚居区一旦形成,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便纷纷涌入。同法拉盛相似,蒙特利公园市一开始最主要的移民也是来自台湾的投资者和专业人员。当社区初步成型后,这些投资者和专业人士的家庭移民,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东南亚的移民就接踵而来。到20世纪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人口开始超过来自台湾的移民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和1990年之间,有44%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选择蒙特利公园市作为他们的永久定居地,42%来自台湾地区的移民选择蒙特利公园市作为他们的永久定居地(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1998)。

在法拉盛和蒙特利公园市的经济发展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族裔金融资本的作用。有关数据显示,在法拉盛的商业中心区,华人拥有的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估计占全部生意的23到34之间。华商企业种类繁多,跟其他小城市商业区比较起来不相上下。蒙特利公园市的发展则更具规模,在7.7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有三家中文报纸以及多家地方中文小报、中文电台和电视转播台,还有数以百计的餐馆、房地产公司、中式超市、夜总会、中西医诊所、牙医、会计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专卖店、古董店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Fong, 2001: 316)。由于有更多的来自台湾的人力和资金资本的投入,台湾人所拥有的生意和台湾人对当地政治活动的参与,使蒙特利公园市赢得了“小台北”的俗称,并获得了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移民的认同。人口构成的多元化,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并改变了社区的传统组织形式。

蒙特利公园市另一个明显的华人移民特征是跨国穿梭移民的现象。近期有这样一批华人移民,传媒称他们为“空中飞人”——自己在太平洋两岸穿梭,而把家属和子女安置在蒙特利公园市定居和上学(Fong, 2001: 316)。所谓“降落伞孩子”也是跨国穿梭移民派生出来的现象——许多未成年的“降落伞孩子”被送往美国,远离父母亲人,独自生活和求学,而他们的父母则留在亚洲(Zhou, Min, 1998)。这些跨国家庭也已成了移民选择的居住方式之一。与早期把自己家人留在中国而自己只身一人在美国淘金的华工相比较,差异十分明显。事实上,蒙特利公园市华人新移民代表了一种新的移民方式和一种新的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与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拉丁美洲裔和亚裔的美国人从移民聚居区外移的方式不同,如今华人新移民不经过在唐人街的积累过程,而直接定居在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

上述分析表明,新华人移民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新移民所拥有的雄厚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新华人移民社区族裔资本呈现了全新的状态,其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关系如表2所示。

虽然新华人移民社区的社会资本,随着新移民的增加和社区不断发展仍然在变化发展之中,但与唐人街的社会资本相比较,不仅较为薄弱,而且出现了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1)唐人街中华人占到了绝大多数,社会网络的高密度和高强度能同时出现。而新华人社区是多族裔混合聚居区,杂居形式使社会资本在载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密度和高强度以及控制力强的社会网络也不再可能出现。(2)唐人街中占主导地位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新华人移民社区已被业缘关系所取代,即弱纽带取代了强纽带关系。(3)唐人街呈现出一个等级清晰的、家族式的组织结构,而在新华人移民社区,组织和企业的数量和密度堪比唐人街,但已很少有组织以家族和家乡来命名,也很少以宗族、祖籍关系为联系纽带,即使是同乡会也多以省、市等较广阔的地域为基础,而商会则以业界协会的形式出现,行业的划分更加精细,视野也更加全

表2 新华人移民社区族裔资本的分析

族裔资本构成	强弱表现	族裔资本内在关系
人力资本	+	基础
金融资本	+	基础
社会资本	-	结果

球化;更没有出现像中华公所那样具有绝对权威的政治经济全控组织,也没有出现其他垄断性的社区组织。相反,大量松散的、跨越地区、族裔甚至国家的专业性组织大量涌现。(4)与传统的华裔组织相比,新华裔组织虽然结构系统化,但组织对成员却没有严格的控制,成员的流动性大、组织参与的重叠性低,大家合则聚,不合则散。新华裔组织大多依赖少数组织者个人的热忱和自愿工作,缺乏监控和长远计划,随着组织者的更替往往是彻底改弦更张。虽然这些组织对华人社会的控制较弱,结构也不再等级森严,而是呈水平发展,但在提供社交网络、信息交流以及帮助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等方面,仍发挥了一定作用。(5)新华人移民社区的社会网络超出了唐人街局限于传统的家庭、亲缘和家乡关系的范围。新华人移民社区的社会网络不仅与主体华人社会有密切的关系,还与美国主流社会有多种多样的联系。自8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的华裔组织已超越了华人聚居区的地域界线。这些不受传统地域和族裔文化限制的机构有专业协会、校友会、市郊华语学校、宗教组织及政治和公民权利组织。它们在动员社区成员参与本地政治活动、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新聚居区的政治和社会服务组织大多具有种族多元化性质。

新移民把他们带来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移民经济形式——跨国企业经营和本地经济发展中的海外投资。这种经济形式改变了传统的族裔经济的运作方式,促进了原有相对孤立的族裔经济与外部经济体系的对接,使新华人社区经济走上了一条非传统的道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美国人口普查报告表明,从1977年到1987年的10年间,华人企业增长了268%,相比之下,亚裔企业增长了238%,而拉丁美洲裔企业和非洲裔企业各增长了93%,从1987年到1997年的10年间,华人企业又增长了180%,从1987年的9万家增加到1997年的25.3万家。现在华人拥有的企业数占全美少数族裔企业的9%,但是其营业收入却占了全美少数族裔企业营业总额的19%(Zhou, Min, 2003: 37-44)。

## 五、结 论

首先,美国华人移民社区转型的背景是1965年后美国移民法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华裔移民潮,但更为宏观的背景是经济的全球化。这些背景的变化使得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和配置。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优势,美国与其他环太平洋移民国家多年来竞相推出引进高科技人才和投资移民之优惠举措。因此,许多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如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澳大利亚的悉尼和新西兰的奥克兰等等,华裔郊区聚居区都已初具规模。美国是华人社区形成最早和发展最快的地方,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新移民利用其拥有的族裔资本所营造的新华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其多元性、开放性和国际化的特征相当清晰,促进了原有相对孤立的族裔经济与外部经济体系的对接,使新华人移民社区经济走上了一条非传统的道路,既能快速发展,又能促进与主流社会的联系和同化。

其次,在美国移民历史上,新移民一般都被视为贫弱者,他们大多聚集在市中心的贫民窟内,几乎每个人都必须从社会的底层开始,通过个人的努力,慢慢地向上爬,经过多年甚至一、二代人的奋斗最终打入主流社会。移民聚居区因而被视为跳板,最终会随着族裔成员的同化而逐渐消失。纽约的小意大利和洛杉矶的小东京的衰退就是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在过去的30多年中,虽然许多新移民仍然聚集在城市中心的少数族裔聚居区,但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大量的新移民在拥有较雄厚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前提下,能够直接进入大都市内的富人区和中产阶级的郊区。许多华人新移民由于有较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可以不需要唐人街作为打入主流社会的跳板,也不需要较强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相反,他们积极建造新华人移民聚居区和族裔经济,而不是消极地等待被同化;同时在运筹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程中,有效地创造或增强了社会资本。传统唐人街的贫民窟形象因此被富有现代气息的族裔经济和族裔文化特质所取代。华人移民社区的这一转型,对美国传统的移民社区发展模式是一个直接的

挑战。

最后,在对一个特定族裔群体进行系统分析时,我们所提出的以族裔资本为中心的解釋性框架可以避免单一使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分析所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和互动关系。林南批评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功能观点,认为科尔曼以社会资本产生的效果来界定社会资本是一种套套逻辑,原因是把社会资本与它所产生的效果混淆在一起。林南认为如果社会资本要成为有用的社会学概念,则在概念上必须把社会资本与其所产生的效果分离(Lin, 2001: 28)。我们在本文中选取两个相对独立的个案作为对比,可以较容易地看出社会资本效果的差异。通过对唐人街和新华人移民社区族裔资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不仅仅是结果,一种结构资源,蕴含于结构本身,其更是一个发展和互动的过程。所以,静态地使用社会资本作为分析框架的研究,往往会产生分析上的偏差。

参考文献:

周敏, 1995,《唐人街: 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 鲍霏斌译, 商务印书馆。

Arax, Mark 1987, "Monterey Park: The Nation's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6.

Bourdieu, Pierre 1985, "Forms of Capital." in J.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Dugger, Celia W. 1996 "Queens Old-Timers Uneasy as Asian Influence Grow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Edwards, Richard C.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Fong, Timothy P. 1994,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A New and Dynam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in Marta López-Garza & David R. Diaz (eds.) *Asian and Latino Immigrants in a Restructuring Economy: The Metamorphosi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ton, John 1995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Immigration, Resistance, and Change in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ight, Ivan H. 1984, "Immigrant and Ethnic Enterprise in North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7 (2).

Light, Ivan H. & Gold, Steven J. 2000, *Ethnic Econom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Li, Wei 1997,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an Urban Ethnic Community from Chinatown to Chinese Ethnoburb in Los Angele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i, Jane H. 1996 "Neighborhood Report: Northern Queens: Common Heritage, but No Common Groun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Sunday).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vin, Jean 1991, "Immigrants Migrate to International City." *Crain's New York Business*, vol. 7 (27), July 8.

Portes, Alejandro 1988 "Social Capital: The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Portes, Alejandro & Robert L. Bach 1985, *Latin Journey: Cuban and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ortes, Alejandro (eds.)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ito, Leland 1998 *Race and Politics: Asian and Latino and White in Los Angeles Suburb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Tolbert, Charles Patrick M. Horan & E. M. Beck 1980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egmentation: A Dual Economy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5.
- Tseng, Yenfeng 1994, *Suburban Ethnic Economy: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Los Angele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 1997, "Ethnic Resources as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A Study on 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Los Angeles." 《台湾社会学研究》第1期。
- U. 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s (USINS) 1998,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Waldinger, Roger 1996, "Ethnicity and Opportunity in the Plural City." in Roger Waldinger & Mehdi Bozorgmehr (eds.), *Ethnic Los Ange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aldinger, Roger & Yenfen Tseng 1992, "Divergent Diasporas: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of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Compared."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vol. 8 (3).
- Winnick, Louis 1990 *New People in Old Neighborhoods: The Role of New Immigrants in Rejuvenating New York's Communit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irth, Louis 1956/1928 *The Ghetto*,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rner, W. Lloyd & Leo Srole 1945,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Zhou, Min 1992,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Childr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Educational Policy*, vol. 12 (6).
- 2003, "Chinese Americans: Demographic Trends and Intraethnic Diversity." in Eric Lai & Dennis Arguelles (eds.), *The New Faces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 Numbers,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 Jointly published by AsianWeek, UCLA'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nd the Coalition for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 Zhou, Min & Logan, John R. 1989, "Returns on Human Capital in Ethnic Enclaves: New York City's Chinatow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 1991, "In and Out of Chinatow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Segregation of New York City's Chinese." *Social Forces*, vol. 70 (2).
- Zhou, Min & Rebecca Kim 2003, "A Tale of Two Metropolises: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in David Halle (eds.)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in the New Millenni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hou, Yu 1996, *Ethnic Networks as Transactional Networks: Chinese Networks in the Producer Service Sectors of Los Angele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1998, "How Do Places Matt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Economies in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City." *Urban Geography*, vol. 19.

作者周敏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  
林闽钢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宛丽